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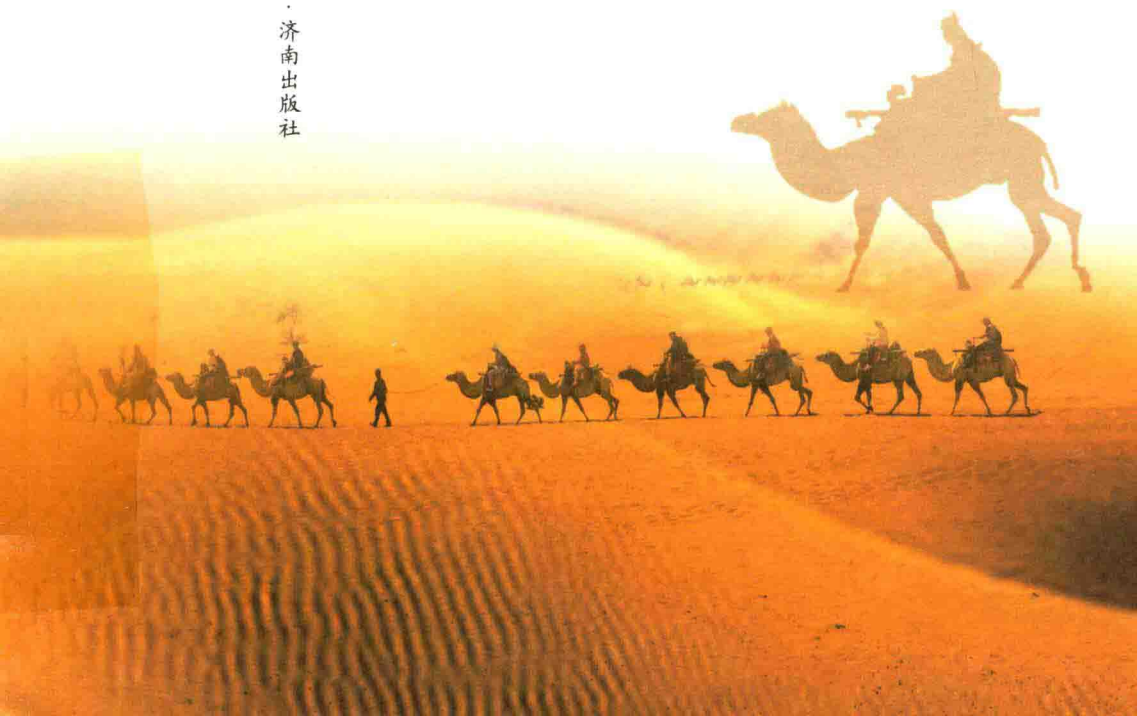
冯并 / 著

# 丝路 文明札记

丝路文明从亘古走来  
标识过去  
照亮未来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 · 济南出版社



冯并 / 著

# 丝路 文明札记

丝路文明从亘古走来  
标识过去  
照亮未来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 ·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文明札记 / 冯并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5488 - 2979 - 9

I. ①丝… II. ①冯… III. ①丝绸之路—文化史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1168 号

---

出版人 崔刚  
策划人 丁少伦  
特约编辑 朱兰芝  
责任编辑 秦天 吴敬华  
装帧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250002)  
编辑热线 0531-86131720  
发行热线 0531-86922073 67817923  
印 刷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40 mm 16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80千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49.80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531-86131736)

## 自序

在研究现代丝路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作《“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和《“一带一路”：全球经济的互联与跃升》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现代丝路与历史上的古丝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承继关系和创新关系。我以为，割断历史关系，无助于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深入理解。在诸多场合，一种有意无意的声音经常出现，那就是强调“一带一路”与古丝路的区别，好像在提倡简单地复兴古丝路。其实，这在任何正常的现代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所谓复兴，其实是精神的复兴，是对过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行为的继承与创新。习近平主席在关于“一带一路”的讲话中强调借鉴历史经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也说明了继承与创新是同一种新事物的两个面。

丝路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经济文化发展的两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地缘规律和市场规律。我们对市场规律已经有所认识，对地缘规律认知得还不够。西方发达的地缘政治学，说到底还是为其地缘经济发展服务的，而我们如果从更久远的历史层面去观察，地缘经济的发展又是与地球文明的发展分不开的。没有人类对地缘和地理的探知与认识，人类文明只能是旋生旋灭的孤立的几朵火花，既不会照亮我们所在的地球，也不会引导我们奔向未来，去寻找我们的前途甚至人类的“第二家园”。因此，济南出版社的同志找到我，说需要这么一本叙述丝路文明的读物，我们也就不谋而合。本书既不是完全的文化交流史，也不是专业的贸易史和中外交通史，而是从人类整体文明发生发展的视角，基于古丝路发育的历史背景，深入透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历史必然性。现代丝路的发展与中国梦的实现，同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我以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与回顾。

本人曾经从事经济新闻工作并对宏观经济有所关注和研究，对区域经济有极大的兴趣，同时对文化问题也有较多涉猎。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过

去的“新闻”就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因。丝路从亘古走来，在李希霍芬之前，它旁若无人地独自延伸，但出现丝路学之后，它就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聚焦点。它标识了过去，也会标识未来。

关于丝路文明的发展，有两个问题。一是丝路的起源问题。在中国，丝路除了兴盛于我们耳熟能详的汉武、唐宗以及宋、元、明时期之外，之前的轨迹也已经宛然在史，纵使你无视它，也不会以你的目力为穷。中国的丝绸毕竟是贸易和文化交流最传神、最耀眼的符号，它代表着丝路文明互动的最高历史境界，但并不代表一切。因此，第一章以较大篇幅列出了前丝路的几个细节。这里还涉及一些古代传说与神话，对历史学人来讲是难入法眼的，但从文化以及文明传播的角度看，你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解读，你却不可以无视它。二是古丝路是否有繁荣与衰败的周期。表面上看有，尤其是从东方的视角来看是如此；但对一些后起的西方移民国家的人来说，难免模棱不清，因此偶有解读，也不及底里。丝路的发生发育是一个亘古不灭的历史现象。一个表面上看去的历史、地理的繁荣与衰落点，并不意味着另一些历史、地理节点的繁荣与衰落。这就像一棵大树，一个地方出现了枯枝，并不妨碍其他更为茂盛的枝头出现。因此，在我列下“丝路第一高潮”“丝路第二高潮”的题目之后，还在“丝路第一高潮”的第一节里欣然写下“不落幕的古丝路贸易”这样的字句。

诚然，作为东方人，我更多地是以东方的视角来叙述。在西方人已经垄断话语权的几百年之后，应当多听听东方的话语，哪怕是对历史的评价与认识的话语。谁都不能自以为是。中国的关于认识价值的最有嚼头的一句古话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古往今来的丝路文明发展问题上，东西方的沟通和交流从来是第一要义。

写作的时间很短，平时积累的知识不算多，只能尽我所能。如果能给读者一些启发，起一点“温故知新”的作用，我已经感到满足。

本书是札记一类的读物，为免去诸多烦琐，引文出处一般在叙述中出现，这样会文气贯通一些。一般史料多直接使用，为此向前行的学者一并致谢。

谢谢济南出版社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是他们启发我写作本书，并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心血。

谢谢一切愿意读本书的朋友。

# 目 录

<b>第一辑 前丝路轨迹</b> .....	(001)
丝路文明从上古走来 .....	(001)
前丝路的东渐产品 .....	(008)
夏商文化与青铜文化 .....	(015)
部族迁徙的十字路口 .....	(027)
楼兰的秘密 .....	(036)
穆天子传达的信息 .....	(044)
重新发现旧大陆 .....	(053)
八大通道与“微丝路” .....	(061)
前丝路历法科技交流 .....	(067)
犍陀罗文化与丝路艺术 .....	(077)
还原《山海经》 .....	(081)
<b>第二辑 丝路第一高潮</b> .....	(088)
不落幕的古丝路贸易 .....	(088)
张骞、班超与甘英 .....	(094)
汉代的西亚丝路 .....	(101)
南亚的丝路循环 .....	(108)
南北朝丝路和隋炀帝的“会展” .....	(115)
丝路贸易的盛唐气象 .....	(120)
佛教东传 .....	(127)

最早的海上丝路 .....	(136)
欧亚科技传播与日本的唐风 .....	(143)
<b>第三辑 丝路第二高潮 .....</b>	<b>(151)</b>
宋代的“多国”丝路演绎 .....	(151)
元代丝路高峰 .....	(158)
阿拉伯商团与蒲寿庚 .....	(164)
马可·波罗和伊本·贝图达 .....	(171)
中国探险家汪大渊及其《岛夷志略》 .....	(177)
海上丝路之魂郑和 .....	(183)
马尼拉—盖普民间贸易 .....	(191)
四大发明传播路线图 .....	(201)
汉萨同盟与黎凡特贸易 .....	(209)
<b>第四辑 丝路涡流与新浪潮 .....</b>	<b>(216)</b>
“大航海”与殖民贸易涡流 .....	(216)
白银战争还是鸦片战争 .....	(222)
后丝路与经济全球化 .....	(229)
大陆桥与海陆联通 .....	(235)
最后的“地中海” .....	(242)
文明的颜色 .....	(251)

## 前丝路轨迹

### 丝路文明从上古走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世界级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条人类文化沟通交流之路和世界文明发展进化之路。丝绸之路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概念，来自19世纪末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著作。李希霍芬1868年到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直至1872年。他不仅提出了震旦系（纪）地层的概念，也敏感地发现，在欧亚大陆内部，有一条地理联通、人文联通和贸易流通的丝绸之路。他是在地理和市场的意义上首次提出和使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他发现在这条长长的欧亚地理通道上，分布着许多“绢的街区”，也就是丝绸贸易的节点城市。与他同时代的另一名德国学者，则进一步把跨国跨洲贸易通道和历史文化交流现象定名为丝绸之路。1910年，学者赫尔曼在其著作《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再次确认了丝绸之路的概念。

李希霍芬的发现掀起了丝路学的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浪潮，欧亚交通史和欧亚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陆续进入中西学人的视野。人们从古代贸易、古代交通、古代的跨区域文化交流，以及科技、宗教、考古和众多的文化遗迹着手，愈来愈明确地勾勒出丝绸之路的长久历史存在，揭示了文明发展与进化的一个重大的地理地缘规律，那就是，丝绸之路不仅连接着世界文明的历史，也将决定着世界文明的未来。

人们肯定李希霍芬的发现，并把这条亘古的贸易之路、人类文化沟通交流



之路和世界文明发展进化之路定格在美丽的丝绸上，并不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浪漫，而是在这条路发展的历史盛期里，丝绸作为堪比实物货币的超级商品，历经千年而价值不衰，代表了极高的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它与后起的东方瓷器、茶叶以及香料一起，连续不断地推动了欧亚贸易与交通的发展。在丝路上，除了物化形态的贸易产品外，还有数不清的科技产品以及如同空气般扩散的文化精神产品不断流动，形成了巨大的商品流、科技流和文化信息流，造就了人类文明交流奔腾的长河。完全可以说，丝路是孕育世界文明胎儿的脐带，是文明机体的心血管系统。这个系统超越千年并没有老化，在可见的未来依然有着非凡的弹性和活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丝路从远古走来，并向未来延伸。它曾经连接古代的多个文明中心，也将连接现在和未来的新的文明策源地，继续书写人类新的文明发展篇章。

着眼于历史和未来，我们或可将丝路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丝路阶段，时间比较长。前丝路与人类的迁徙活动分不开。在许多时候，这些迁徙活动保存在人类对以往的模糊记忆里，甚至是神化的传说里。寻找这些史前的丝路踪迹，是考古者的使命。二是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进入鼎盛期的阶段，有2000多年的历史。整理这个阶段的丝路历史应当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更全面、更准确地还原丝路历史，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三是后丝路阶段。公元2013年开始，应当是后丝路阶段拉开帷幕的时刻。从这一年起，丝路发展从历史记忆里走了出来，开始了更为自觉的实践。历史舞台的布景或已转换，商品交流和文化形态无论从内容还是样式上都发生了变化，但丝路精神没有变化，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传承，也有更多的创新。从后丝路发展的背景上讲，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为丝绸之路从自发到自觉的滚动发展铺平了道路。现代商品体系完全取代了古老的商品体系，扩展了丝路贸易和丝路文化交流的内涵与外延。互联网、物联网的崛起，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使商品贸易和信息传播进入从未有过的高速状态。丝绸之路无论从效率上还是从实现形式上，有了更加多元的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讲，后丝路与古丝路在发展形态上大大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会永远保留的，那就是文明的互动与交流。

丝绸之路，不管是古代形态还是现代形态，都有着人们追求文明进化发展的一以贯之性。因此，在今天的大背景变化里，追溯它的早期发展历史，既是对文明成长的寻根，更是对文明共同取向的探究。至少，我们可以冲破一个时期以来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知误区，比如文明冲突之类的假定等。

在前丝路的古老形态里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地球上最高等的群体智能动物，

人类最基本的天性是相互沟通与接近，尽管各自有各自的多样利益需求。在这里，共同利益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而获得这个最大公约数，则自始至终需要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与文明沟通。这就是丝绸之路不断延伸的最高价值所在。

从丝路概念的本质来讲，丝绸无疑是个传神的符号，它所概括的是人类文明赖以发生发展的物质文化交流的地缘形式和总体过程，也描述了这种交流所能达到的高度与令人神往的前景。丝绸显示着文明的亮色，也显示了创造的希望，因此，我们探寻文明的源头时，既可以从人类在迁徙中追求未来的历史开始，也可以从丝绸自身的创造开始。

在人类度过最后一次冰河期并寻找兽皮和木质纤维蔽体的时候，东方的一缕曙光照亮了桑树，一个新的更有希望的时代开始了。丝绸显示着人类劳动曾经达到的历史高度，无论从价值来讲，还是从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来讲，它都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因此，探寻前丝路的轨迹，必然要从最初的家蚕丝织品出现开始，而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国湖州古潞村落的钱山漾史前遗址。

钱山漾史前遗址介于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距今至少有4200年。钱山漾被公认为世界丝绸之源，是因为那里发现了最早的家蚕丝织品。钱山漾新石器史前遗址是1956年发现的，前后试掘了5次，出土了绢片、丝带与丝线。在比它更早但地域临近的良渚遗址，也出土过原始纺织腰机构件，总体上再现了彼时的丝织原始产业链的基本结构。在历史分期上，这里应属于夏代前期或更早的时期，吴楚一带尚未形成国家体系。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原始家蚕丝绸的生产已经先声夺人形成了气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家蚕丝绸养殖与纺织技术在中国的首创性出现，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桑蚕出现时与已经开始零星出现的青铜器并没有直接相遇，但它们同样都是改写历史的伟大发明。与此同时，丝绸出现，在其扩散中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一般等价物，影响到商业的萌芽与发展。

在中国，发现家庭蚕丝生产遗址的地方或者具有蚕丝考古价值的地方其实很多，远非只在江南地区。从西南到蜀中，从东北到燕山，到处都有各种蚕丝生产的迹象。比如地处燕山东麓的孤竹国旧地，很有可能是先商的发源地，同最早极具规模的红山文化处在一个文化带上。那里至今还有祭祀嫫祖的蚕神庙的古老地名和遗迹。1958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孤竹旧地燕山的迁安旧石器爪村遗址发掘出两具长达3.96米的纳玛象门齿化石，说明那里曾是温暖湿润的地方。在临近的齐鲁之地，远在春秋时代就有发达的蚕桑产业，鲁缟在那

时已是誉满天下的名牌货。

中国丝绸生产发展的过程很漫长，但相较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讲还是一瞬间。至少，从丝绸规模生产的上限来讲，我们从商代的青铜器上发现了伴随的丝绸残缕。春秋时代的管子在《轻重》篇中讲，“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帛牢也就是带有保密性的生产丝绸的作坊。在周朝的早期墓葬里，发现运用了提花技术纺织的绫绮，在《诗经》里则有对桑农之事的反复歌咏。在春秋战国时代，丝绸纺织业全面成熟，出现了平台式和斜卧式织锦机，分别织出文绮、纨素、绫罗与彩锦。由于丝绸的种类繁多，各自的名称也不一样，例如，彩织为锦，素织为绮，轻纱为罗，手织为绣等。绮在公元前15世纪的商代就出现了，锦则在公元前8世纪的周代流行。在战国后期《楚辞·招魂》里，就出现了“纂组绮縠”，也即在绮罗上刺绣的描写。正是这样一种漫长但十分连贯的工艺进步，不仅奠定了中国丝绸纺织品全面发展的基础，而且也使中国丝绸在前丝路时代就走向了周边的部族地区与国家，走向了亚洲大陆的西端。

丝绸的西渐，在前丝路时代就开始了。根据考古资料，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丝绸输出的第一个活跃期。在阿尔泰山两侧发掘的多个斯基泰人部落贵族石顶大墓里，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有零散的，也有覆盖在皮衣上的，甚至还发现金线与丝线交织的服饰残片。大致时间为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波斯锦是用金丝与丝织造的，在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时代已经出现。在较早发掘的著名的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5号大墓里，曾经发现刺绣有凤凰与孔雀缠枝子纹的绸面马鞍褥子，当然也有出自西亚的羊毛制品。在晚于公元前5世纪的草原贵族墓葬里还有秦国风格的铜镜，墓主当是当时的阿尔泰塞人部落首领。诚然，铜镜最早不在中国产生，一般认为是作为草原民族萨满法器最早产生的，进入中国后渐次成为无处不在的高档生活用品，但借助铜镜背面的花纹特点，还是可以区别它的具体工艺来源。在阿尔泰山东侧，新疆阿拉沟发现的竖穴墓，也有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丝绸织品和漆器。

前丝路时代丝绸的西渐能不能到达地中海和彼时的希腊和埃及？人们虽然不能精确地掌握丝绸传到地中海的第一时间和路线，但从各种迹象来看，并非没有可能。第一，分布在阿尔泰山地区的塞人属于东伊朗语族，是当时分布在阿尔泰山以西一直到里海、黑海的总称为斯基泰人游牧部落的一个亚洲分支，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充当了中国丝绸西传的中介。第二，有美国学者很早就指出，希腊雕塑人物的服装尤其是女神的薄如蝉翼的裙袍和胸披，应当是丝

绸织品的写生。希腊公元前3世纪的雕塑与绘画，人物服装都明显地带有透明和轻柔的特征。第三，在西罗马时期，著名的埃及艳后就是一位中国丝绸的“发烧友”，那时的丝绸贸易还没有正式拉开帷幕，但她已经源源不断地获得了中国的丝绸。因此可以推断，在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丝绸已经不胫而走，进入了地中海。

在那时，丝绸作为奢侈品，已经居于价值链的顶端，甚至充当了比黄金还要昂贵的硬通货。但是，对地中海国家来讲，中国丝绸一直充满着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性。晚至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博物志》里这样记载：“赛里斯国以树林中出产细丝著名。灰色的丝生在树上，他们用水浸湿以后，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织成文绮。由那里运销世界各地，实在是非常艰巨的事。”

丝绸在前丝路时代流转的规模，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因为当时的中国为世界所知并成为世界财富的象征，是与最早的丝绸贸易与丝绸流转分不开的；甚至，连中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家名称，都可能与丝绸有着直接联系。中国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叫法，自有其特定的含义，但“支那”，也即英语中的China，则是古已有之的国际叫法。支那这个称谓，曾在很长时间里被当作一种侮辱与蔑视，这其实是一种来自半殖民时代的误解。支那这个称谓，在公元前5世纪就见诸古波斯的文献，在波斯的费尔瓦丁的颂词里就有“支尼”的称谓，发音与古代中亚粟特语相近。粟特语属于东伊朗语族。在古印度经典里，也将中国称为支那。古印度公元前10世纪的《政事论》就有关于中国丝卷的记载，并传达出两个历史信息：一个是中国被称为支那，一个是中国与丝绸直接联系起来。很长时间里，有一种说法一直挥之不去，那就是“支那”是“秦”的对音。尽管那时的秦国先后称霸西戎而统一六国，对中国西域地区版图的整合有重大影响，但它还不足以引起地中海国家和南亚国家更多的注意，倒是前丝路时代的丝绸贸易和流转使它们对东方的伟大国家有了深刻的认识。人们知道，中国作为历史概念，是一种政治上的泛称，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国号，如汉、唐、宋、明、清等。作为一种外部的地理称呼，一般应当有显著的相对稳定的特点。例如俄罗斯在其扩张中更多地与辽接触，便用契丹作为中国的指代；而古波斯与古印度，更多地借助贸易与商品流通尤其是特殊的商品来源认识域外国家。

对于支那这个中国称谓，还有一种来自于“绮”的音转的说法，颇有些道理。因为绮是最早与最多走向世界的中国丝绸品种。至于为什么这样讲，可以从一般的地域命名原生规律去分析，比如有的根据显著地理特征，有的则是根

据稀有的特产等。中国的丝绸很早就独步世界。古希腊人对中国也有过“赛里斯”的称呼，这个称呼在上文提到的《博物志》里仍在使用，但没有延续下来。其含义似乎是指地处中亚的丝绸贸易“二传手”民族，因为罗马文献里说他们是赤发碧眼的人种。他们在丝绸交易中有意无意地自称代表中国。这种品牌惯性一直到11世纪还存在，因为与中国丝绸有关联的一切，都意味着“高大上”。这就如汉代的中国人曾经把罗马看作是泰（太）西之国，喻其遥远而疆域之大、居民高大类如中国。公元初的罗马作家普林尼把赛里斯看作是亚细亚最东边的国家，也有同样的意思。公元50年，罗马史家波庞尼斯·梅拉就提到，亚细亚极东的地方有印度人、斯基泰人和赛里斯人，印度人在南，斯基泰人在北，赛里斯人居中。按这个地理方位判断，赛里斯人最有可能是当时经营丝绸的大夏和月氏人，或者是唐代的粟特人群。那时候罗马人记录中的中国人都是红头发、蓝眼睛的一种形象，罗马人自然很难把赛里斯人与中国人等同起来，但又很难将其断然分开。

希腊作为最早的航海民族之一，通过印度洋贸易也即厄立特里亚海上贸易更多地认知了中国。据佚名希腊船长留下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记载，希腊人在继续称呼中国这个丝绸的国家为赛里斯的同时，还称中国为支国，认为经过当时被希腊人称为克里斯国的马来半岛，可以进入支国海，那是当时航行的终点。这个支国也就是支那。如果说，“支”是“丝”的对称，倒是符合商品直接音译规律。比起另一种流传已久的秦国的音转说法，要合理得多。因为，即使那时的秦国也曾西进，其影响范围也有限，断不至于使远在地中海的希腊人感受到它的影响，必须要用秦国的国名发音来命名。当然，我们也不必断然否定秦音转一说，毕竟秦代表着一个东方古国的强盛。

不管怎么说，丝绸代表着中国，也是古代中国通行的国家名片。就早期丝路贸易萌芽发育而言，中国丝绸的影响的确是巨大和轰动的，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由来已久的外部名称，这就像地中海的居民将盛产腓尼基紫红麻布的地方命名为腓尼基一样。

丝绸与丝绸产业链出现在古代中国，中国由此成为丝绸之路的发端国家，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古代的养蚕业规模庞大，以至于桑麻成为农业和加工业副业的代称。养蚕业之重要可以从黄帝主妃嫫祖被尊为蚕神和先蚕娘娘，历代君王要耕“一亩三分地”，历代后妃都要举行祭祀蚕神的仪式，也要做采桑养蚕的表演秀看出，这其实是古代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最高境界。嫫祖成为中国的先蚕娘娘，或有托古的影子，但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传说中黄帝的年代

要比发现了丝带、丝线和丝绸残片的良渚文化遗址年代还要晚些，蚕丝业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里。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的原生字，而且“丝”字还被用作构词造字的重要表义偏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远古的丝绸业具有种植、养殖和手工业连续联动的特点，其产业链条比青铜制造还要长，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泛，北至燕山，东到齐鲁、江浙，南到珠江流域、四川盆地，西到河西走廊以至更远的塔里木南缘地区如和阗、龟兹等。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到处都有显著发展的市场与流通的中心，其发育的盛衰周期一般与历史气候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丝绸作为高档奢侈品，不仅可以抵偿税赋，还可以充当实物货币，在满足上层消费需求的同时，进入多种流转环节，成为古代财富的象征与载体。丝绸最初用作贡赋与赏赐，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也就进入了商业交换，扩大到周边和更远的地区。

中国在古代就是一个用“五服制度”维系的幅员辽阔但经济形态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中原和临近中原的地区是农业地区，桑麻生产发达，中原之外多是游牧乃至渔猎经济地区，经济比较单一，缺少中原农业地区所具有的桑麻资源优势，互补要求强烈。这种不同地理经济单位的边际性交换，又直接和间接地向更远的地区传导，日复一日，形成了由近及远的丝路效应。

丝路效应乃至前丝路出现的确切时间，是难以考证的，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与邛杖，感到很惊奇。虽然史料里没有提及发现丝绸，而只是确认了丝绸之路的多向存在，但是，这也并不会降低张骞通西域的伟大成就——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类古代商品和以科技文化信息为主的知识产品，在丝路上源源不断地东西对流，从而使丝绸之路开始定型。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也在事实上确立了古印度在前丝路贸易中的中转地地位。货物从中国的西南地区，经由后来被称为博南道的怒江河谷辗转进入南亚次大陆，沿着喜马拉雅山麓进入印度河流域，再入大夏也即今天的阿富汗周边地区，最后进入古波斯。中国的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历来盛产蜀布，也是蚕桑丝绸业较早发展的地区，甚至是古代蚕丝业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在西南丝路上，坝子经济和马帮经济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形成了农耕与商业并重的坝子文化和马帮文化。马帮文化是长途贩运者的文化，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具体发展动力。坝子文化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外部交换是必要的补充。西南地区很早就是藏缅语族民族与苗傣民族交错分布的地区。有趣的是，中国的东南、西

北与北方，虽然都有方向不同但往往是殊途同归的丝路在延伸，文化和市场景观却并不相同。在北方，是古代的绢马交换，在西北是驼队，在雪域高原是牦牛，在西南则是山间的马帮。同样是西来的佛教文化，在西北是石窟，在西南是林立的佛塔。古丝路景观的差异体现着丝路经济的多样性，也体现了丝路文化的包容性。

伴随丝绸流通半径的不断扩大，在前丝路时代，中国的科技文化也开始向外传播。据《史记》记载，在西周末期和东周初期，外患与内乱导致“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畴人就是从事天文与历算研究的学者。夷狄在历史上分布在中原的周边，部族交错的状态远比后来复杂，体现了同一个有联系的文化系统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前丝路时代出现的古老文化印记，不仅记录了丝绸更为悠久的历史，也展现了欧亚文明相互对流传播的历史规律。丝绸之路被地理地质学者用来描述这样一种亘古的文明现象，一方面说明丝绸流通在文明传播中的显著性，另一方面也极为传神地揭示了文明发育成长的地缘规律。许多同时和前后出现的历史文明概念，如陶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次级商品，如瓷器、茶业、玉石、皮毛、香料、珠宝等的跨域交流，还有更为重要的文化精神层面的交流，其实都体现和遵循着这条规律。这也说明了，丝路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条贸易之路，而是一条文明流布的人间正道，是一条伟大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连接发展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玉石之路很有可能是丝绸之路西向的先声。《山海经》列举玉石产地 100 多处，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这一带的古方国素有金玉之邦之称。罗布泊曾经出土过 4000 年到 6000 年前的和田玉。《穆天子传》中讲，穆王西巡昆仑，曾经“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而据《考工记》所记，夏商周三代已有专门琢玉的“玉人”“玉府”。可见在公元前 13 世纪，玉石之路已经开通，时间也可能略早于丝绸和桑蚕的西传。有学者据此得出玉石之路早于丝绸贸易开通，有一定的道理。

## 前丝路的东渐产品

由于文明发展的互动规律，在前丝路时代，不仅华夏地区向欧亚大陆输出了丝绸与蚕桑文化，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也向华夏地区输出了至关重要的马文化、麦作文化、毡氍文化甚至黄金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的驯养、小麦种



植东传、羊毛纤维和黄金的利用。此外，还有骆驼的驯化等。骆驼的驯化对于陆上丝路正式开通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马、小麦、羊毛和黄金、玉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几种产品及其技术的东渐，改变了交通与战争的形态，扩大了大陆居民营养和衣食的来源，而黄金作为财富的象征和长期以来支撑流通活动的一种硬通货，更有普遍的经济意义。东渐的马、小麦、羊毛和黄金技术同西渐的丝绸，交织成前丝路时代五光十色的文明发展画面，直接拉开了丝路时代的大幕。

提出前丝路的概念，研究前丝路文化现象，不仅是对欧亚大陆早期连通的一个地缘上的肯定，也是对丝路文明的一种重要源头揭示。应当说，在前丝路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活动已经十分活跃，随着大陆早期居民的频繁往来迁徙，信息交换与物品交换不断发生。这种交换与交易主要发生在原生农业和畜牧业、采石业以及有关的初级产品和基本需求的领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把前丝路称为动植物基因传播之路，马匹和骆驼、牛、羊驯养之路以及黄金玉石之路，甚至是价值曾经压倒过天然宝石的玻璃的东传之路。

小麦、大麦的原产地是西亚和北非的新月沃土地区，也即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那里是灌溉农业的第一个发祥地。尽管最近有欧洲学者通过基因的联系和差异分析，认为那里的农业是在缺少直接交流的环境中各自起源的，但这不会是一个常态。因此我们在更广泛的区域里看到麦类种植的传播，比如在古埃及的石刻画里，看到了农人一起收割麦子的场景。所谓新月沃土，很好理解，大河的冲积平原总是弯曲狭长的，土地也是肥沃的。在那里诞生地球上最早的农业文明也是必然的。在伊拉克北部也曾发现过距今8000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小麦，而中国出土的小麦，目前最早的是在楼兰附近的小河墓地。在小河墓地的墓葬里，船形棺里多有草编的篓袋，里面装有小麦。小河墓地的地质年代距今4000年以上，小麦从两河东传，经过了一个漫长历程。人们从离小河不远的吐鲁番洋海古墓群也发现过距今3000多年的小麦，那时的中原已经进入商周交替时期。有了麦类才有了中国“五谷丰登”的更为完整的谱系。

麦类是周人从西边引进并成为重要食物的，便被视为“瑞麦”，还由此产生过一种由周王主持“尝麦”的特别仪式，类似于后来的“尝新”。《逸周书》记载了周成王时孟夏“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的盛大活动。对于这个活动，《礼记·月令》中也有“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的记载。

与主要食物相关是稻作起源与传播的原因。稻作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一



般认为起源于中国西南与印度的阿萨姆邦地区，也有认为起源于江浙的。最近的考古成果证明，水稻种植和野稻驯化更可能在中国的东部发生。2016年，中国考古人员在江苏淮河流域的泗洪韩井遗址发现距今8000年的水稻田遗迹以及碳化稻。在此之前，在中国浙江的上山遗址也发现了距今1万年的碳化稻。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稻。驯化水稻的确切起源、传播路线和走向，人们还在研究，但西来的麦作和东亚的稻作，确乎是对人类食谱的划时代贡献。如果还有什么可以媲美的，则是后来来自美洲的玉米以及东南亚的薯类。当然，麦类东来，也伴随着中国的谷类西去，如荞麦、粟类。无论是麦类、水稻，还是中原的杂粮，都是前丝路文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马的驯养也是一场革命。在时空悠长的古代交通中，马无异于今日的高铁，其与跨区域战争发生的概率关系直接。马的驯养和大量使用最早在人头马“马人”的故乡，即黑海与里海的草原周边。“水马旱羊”是牧业资源形成的自然规律。地缘相近也给了中亚人繁育良种马匹的机会，以至丝路开通之后，汉武帝念念不忘的就是大宛的“天马”。马的西来很早，向东传播的链条中也有周人。周的一位有声望的首领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大概是发生在商王朝堂上轰动一时的新闻，被《诗经》记录下来。商人则是役牛和使用牛车的，因此王亥关心的是如何贩牛。史载救郑的弦高就是贩牛的商人。春秋时期中国已有医马、相马的伯乐，而周朝用百乘和千乘的概念来衡量诸侯国强弱，可见在周朝马已经普及到中原。

把马与蚕神连接起来的马明王的民间传说也很有意思。荀子的《蚕赋》也有蚕神“身女好而头马首”的字句。据《通俗编》所引的《原化传拾遗》记载，蜀中有女，父亲出走，母亲起誓说，谁要是把她的丈夫救回来，就把女儿许配给谁。院中的一匹马听后奔驰而去，很快把她的丈夫救了回来，但她忘了诺言，或者根本想不到要对马兑现诺言，马儿嘶鸣不已，不肯饮水吃草。她的丈夫知道了缘由大为恼怒，把马杀了并把马皮晒在庭中。女儿经过庭中，一阵风起，被马皮卷到桑树上，化为蚕，这蚕昂起头来，还真有马的气势。这个马头娘或者马明王的传说，佐证了蜀中是桑蚕的一个起源地，也佐证了马的输入既广泛也很早。马明王在北方也被称作马王爷，传有多只眼，与北人尚马有关。

马的引进于汉武帝时期为盛。唐玄宗时也在河套地区的五加河北部的受降城大开马市，以丝绸、茶、盐交换马匹。回纥商人与内地人交易，以马折绢，绢被称为马价绢。在那个时代，马居然代替丝绸成了硬通货。

绢马市的出现，在宋神宗时代又引出了专门的茶马互市。明永乐（1403~